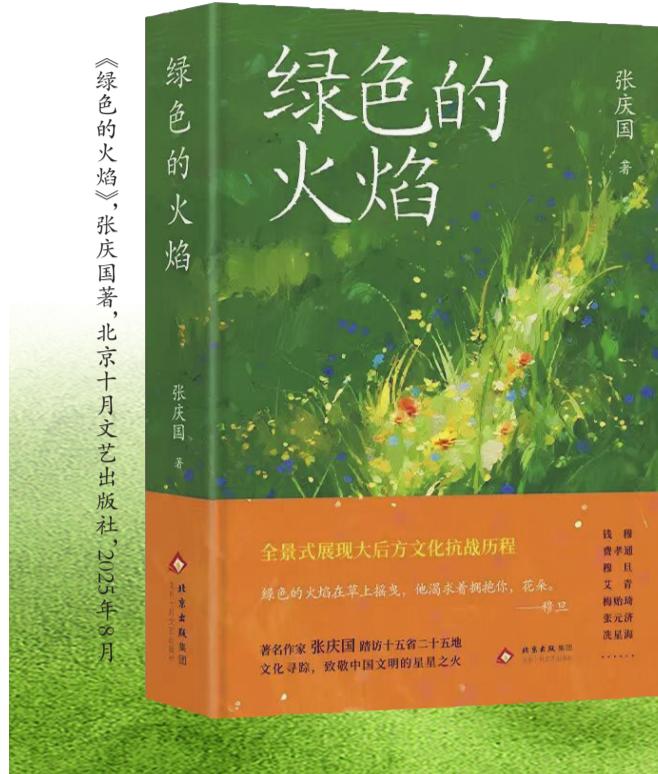


■新作聚焦

张庆国非虚构作品《绿色的火焰》:

抗战烽火中的文化坚守

□梁鸿鹰



非虚构作品《绿色的火焰》采用多维度、多人物、多事件交织的叙事结构,将抗战时期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文化守护者的过往串联起来,构建了一幅幅丰富立体的文化抗战图景。作品让我们看到,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只要有人为文化坚守,民族的希望就会如“绿色的火焰”般,汇聚成照亮未来的火炬,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熄灭。

作家张庆国的长篇非虚构新作《绿色的火焰》以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冒着敌人炮火迁徙、教育机构为保存实力南下东进、文艺创作汲取营养实现突围、文化遗产得到抢救等多维叙事,打捞在战火中濒临湮灭的文化记忆,以史诗般的壮阔、考古学般的精密,揭示了文化延续文明传承的韧性。

《绿色的火焰》采用多维度、多人物、多事件交织的叙事结构,将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文化守护者的过往串联起来,构建了一幅幅丰富立体的抗战文化图景。作品以“思想”“声音”“杏坛”“光亮”“歌唱”“舞台”“秘密”七个部分为框架,每个部分聚焦不同的文化领域与人物群体,依次叙述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南下坚持古建筑考察研究,钱穆在云南宜良泉寺隐居撰写《国史大纲》,穆旦、艾青与王礼锡等诗人在战火中用诗歌传递抗敌激情,梅贻琦和竺可桢带领西南联大与浙江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培养人才,光未然、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延安迎来文艺勃兴,张元济重建商务印书馆,王芸生坚持发挥《大公报》阵地作用,熊佛西、欧阳予倩呵护话剧艺术,厉家班薪传戏曲火种,故宫文物逶迤南迁等历史故事……这些看似独立的叙事线索,与“文化坚守”这一核心主题紧密相连,勾勒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整体风貌。

作品采用“群像式”叙事方式,既刻画了梁思成、林徽因、梅贻琦、竺可桢、欧阳予倩等广为人知的文化名人,也关注到王礼锡、厉彦芝等较少被书写的文化守护者。作者没有将人物符号化、英雄化,而是深入挖掘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脆弱与坚韧。作品中有很多动人的细节描述,如描写梁思成在李庄时骨瘦无力,用花瓶支着下巴,夜以继日地绘图;钱穆在岩泉寺一边吃斋一边撰写《国史大纲》;梅贻琦校长自付住宅房租;西南联大教授兼职谋生补贴家用;竺可桢在迁校途中强忍痛失妻儿的悲伤……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细节让历史人物的行为变为“可感的生命体验”,展现文化群体的共同担当,凸显个体在抗战洪流中的独特光彩。

作品对抗战时期的昆明、桂林、武汉、成都、重庆、延安等地作为“熔炉”的多样性进行了细致描述。南北学者、艺术家在不同地方的思想深度碰撞,传统文人与留洋学子的心灵对话,发生在他们走向民间、了解国情、传承文化的特殊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领营造学社指导修复古建筑,钱穆撰写史学著作,费孝通开展田野调查,光未然、冼星海创作大合唱,厉家班迎来戏曲复兴,以及故宫文物藏品迁移保护……这些历史故事都在告诉我们,抗战时期在广袤、偏远、粗犷的乡野里,中华文化依然焕发着新的生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宜宾李庄这个当初只有3000人的镇子,最高峰时曾容纳12000多名外来文化人;安谷的乡绅让出宗祠庙宇支持文物安放,村民“用土法保存古籍”。民间社会与知识分子的共生共荣、文化共鸣,形成了文化传承的良性循环与双向流动,说明文化的存续从来不是精英的独舞,而是庙堂与乡野合力共同选择的结果,在战火洗礼中,文化因子被筛选保留,获得了可喜的变异与重生。这部作品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还提供了新的认知,揭示了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物质载体的坚固,而在于核心价值的感召力。文明在绝境中自我更新,文化在苦难中传承发展,或许是历史给予我们最宝贵的馈赠。

作者为创作这部作品,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以及江苏、江西、四川、贵州、广西等15个省市25个地方广泛调研,将实地寻访的见闻与历史场景交叉呈现在文本中。对梁思成迁徙路线、西南联大旧址、故宫文物南迁遗址的“田野调查”,将历史回忆与现实观察交织起来。如在描写李庄时,作者写道“2024年10月17日我从四川乐山坐高铁去宜宾,寻访梁思成的身影”,随后自然过渡到梁思成当年在李庄的生活场景;在讲述故宫文物南迁时,作者亲赴南京浦口火车站、上海仁济医院旧址等地,用现实场景的寂静反衬历史事件的惊心动魄。这种“现实探访+历史回溯”的叙事方式,打破线性结构局限,通过微观考古与时空折叠,让抗战时空与当代时空形成对话,不同身份的声音编织成合唱,将散落的历史碎片连缀为立体画卷,增强了真实性与实证性,让读者在时空交错中更深刻地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面对旧址、故地被废弃,或被辟为游客拍照打卡之地,静谧与喧嚣碰撞,作者也发出感叹,追问“精神遗产如何真正被继承”,引发我们对“文化传承是否变质”的思考。

作者擅长捕捉最能体现人物处境与性格的细微之处,以细腻的细节描写,生动呈现抗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场景、精神状态与文化事件,让冰冷的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可共情。如记录钱穆在宜良泉寺写作时,“每晚入睡前要看《清史稿》数卷”“周日下午或周一上午,携《陶渊明诗》去岩泉寺东面八里处的温泉洗浴喝茶”。刻画冼星海在延安窑洞创作《黄河大合唱》时,“手肘支在桌上,白天听着窗外北风呼号,想起船夫号子的吼叫,借窗外的光线埋头写作,夜晚注视着桌上摇晃的油灯灯芯,灵感阵阵涌现”,以油灯、北风、船夫号子等细节,营造出艰苦却充满激情的创作氛围。描写故宫文物南迁时,十分专业而细致地记录了仔细包装文物的复杂过程,展现了文物工作者的严谨与用心,让读者感受到文物南迁工程的艰巨与伟大。讲述西南联大师生步行迁移时,通过勾勒师生路途的艰辛,凸显了他们在苦难中的乐观与坚韧。

《绿色的火焰》还通过丰富的文化隐喻,将文化人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文化传承与民族精神紧密联结,赋予作品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思想深度。书名出自诗人穆旦《春》一诗中的名句:“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绿色的火焰”作为作品的核心隐喻,贯穿全书始终,既是自然景象的描写,也是文化生命力的象征——在战火纷飞的“草上”,文化如同“绿色的火焰”般顽强燃烧,“渴求着拥抱”民族的希望“花朵”,既象征战火中顽强生长的文化生命力,也隐喻知识分子“向死而生”的精神。梁思成、林徽因对古建筑的保护与研究,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骨骼”的守护;穆旦、艾青、王礼锡创作的诗歌,象征着民族精神的“声音”,唤醒沉睡的国人;欧阳予倩、厉彦芝推动的不仅是戏剧艺术,更是搭建起在战火中为民众提供精神力量的文化“舞台”。而张元济、王芸生捍卫的书籍与报刊则象征文明的记忆,对其的保护对应着“历史记忆如何对抗遗忘”。故宫的文物,象征着民族的“灵魂”,它们的安全迁移,意味着民族精神的延续。这些文化载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民族精神、文化传承的象征。这些象征让思想从“抽象概念”变为“可感的生命体验”,“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不再是空洞口号,“文化保护”不再局限于“保存物质遗产”,而拓展为“守护文明的精神基因”,“文化坚守”的思想不是浪漫化的想象,而是充满抗争的复杂过程。作品让我们看到,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只要有人为文化坚守,民族的希望就会如“绿色的火焰”般,汇聚成照亮未来的火炬,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熄灭。

(作者系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关 注

若论地域之辽阔,占地面积超过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无疑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一批新疆作家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称之为“新疆现象”。

这一趋势最初的征兆,出现在以散文闻名的刘亮程身上。早在1999年,凭借《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被文学界誉为“乡村的最后一一位哲学家”,自此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散文出道,但具备文体自觉意识的刘亮程很快便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一般而言,作家写小说多遵循先中短篇,后长篇的循序渐进之路,因长篇小说通常被视为一种集大成的文体。然而艺高人胆大的刘亮程却一反常规,一上手就直奔长篇而去。他先推出《虚土》,后有《凿空》。如果说《虚土》尚未完全摆脱散文的笔调窠臼,那么到了《凿空》,就已经展现出完整的长篇小说形态。紧接着,他又发表了极具艺术想象力的《捎话》。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现代主义笔法,刘亮程将目光投向千年之前,聚焦那个遥远时代的古老宗教信仰,以及围绕信仰所产生的文化冲突与人性挣扎。更进一步看,因明显抽离了具体时代与社会背景,《捎话》在象征与隐喻层面亦可被视为一部关乎人类整体命运、寓言特质极为突出的杰出长篇小说。

再之后,便是更充分展现刘亮程思想与艺术个性的《本巴》。尽管该作依托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但无论情节架构、艺术手法还是思想内涵,毫无疑问都可视为刘亮程的一种全新创造。从关键词的角度出发,倘若说理解《江格尔》的关键在于“战争”与“英雄”,那么理解《本巴》的核心则在于“时间”“童年”与“寓言”。更进一步说,如果从“时间”的发现与顿悟出发,整部《本巴》甚至可被看作一场“时间幻术”的呈现。再极端一些,“时间”在小说中犹如一位隐形的主人公。这部作品于2023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成为新疆首部获此殊荣的长篇小说。难能可贵的是,获奖后的刘亮程并未停留在这一崇高荣誉上,仅在两年后的2025年,就推出了新的长篇小说《长命》。

何为“长命”?在我看来,刘亮程之所以要把自己这部小说命名为“长命”,一方面源于贯穿全书的主人公名为郭长命,另一方面也因其具有的象征意义——生命的长久延续。所谓生命的本质,其实正是时间的长度。大约正是感知到这一点,孔子才在川上发出“逝者如斯夫”的长叹。作品中,刘亮程借助可游走于人鬼神之间的神婆魏姑,巧妙地实现了时间的叠加,抵达了某种穿越时空的艺术境界。

然后,是早在2003年就以长篇小说《白豆》惊艳全国文学界的董立勃,于2024年初在《收获》杂志推出了长篇小说《尚青》。既然曾经取得过《白豆》这样的成功,当他在时过境迁20多年后再一次推出《尚青》的时候,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他的小说创作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哪些因素不复存在?哪些因素一如既往?从不变的特质来看,董立勃其一贯的优势仍在——擅长讲述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而围绕女主人公展开的曲折情节,其背景也始终锚定于新疆那块幅员辽阔的大地。如果从变化的角度来考量,也有两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其一,是将故事背景设定为风云变幻的民国年间,聚焦讲述民国奇女子尚青的故事。其二,则是在加入非虚构因素的同时,对人生命运本质的思考与认识也变得愈加复杂与深邃。

在虚构层面,董立勃所讲述的是,尚青与杜涛、程丰以及吴长明三位男性之间曲折复杂的情感纠葛。其中最具命运讽刺意味的,莫过于程丰这一形象前后截然不同的反转。原以为他是出卖并迫害杜涛的罪魁祸首,不到头来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被冤枉者。伴随着程丰形象的反转,尚青的形象也发生转变,从一位充满愤怒的复仇者蜕变为真诚的赎罪者。

在非虚构层面,作品聚焦曾在新疆现代历史上显赫一时的盛世才——盛督办个人形象与命运的几度变迁。他从原本带有鲜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热血青年,一步步蜕变为权势显赫的老练政客,其间人性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惊人的扭曲与变异。

在充分肯定《尚青》思想艺术价值的同时,还必须提及:据悉,董立勃一部聚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新的长篇小说《垦荒》已经完成,并已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支持名单。这部尚未谋面的《垦荒》,其思想与艺术品值得期待。

曾以《桃李》和《老风口》引人瞩目的兵团作家张者,已多年不涉猎兵团题材,但近日完成了长篇兵团叙事作品《天边》。在我看来,张者之所以重返这一题材,并耗费十年时间数易其稿,正是其内心深处难以动摇的兵团情结使然。这种正面强攻兵团题材的创作勇气,理应赢得我们充分的敬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1954年正式成立,虽曾在1975至1981年间被短暂撤销建制,但总体而言已走过70年历程。若以20年为一代人的成长周期,70年则正好涵盖三代人。为达到全景式呈现兵团人奋斗史的艺术目标,张者在《天边》中正是以三代人为书写框架,重点聚焦第二代中的三个典型人物——黄建疆、姚远和李军垦个人的曲折成长经历,以兵团宏大而跌宕的发展历程为背景,采用双重成长叙事的方式,在读者面前铺展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兵团全景画卷。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出道稍晚、在文坛尚不出众,但近年小说创作却不容忽视的作家李健。其实早在2012年,李健就出版过长篇小说《木垒河》。十多年后重读《木垒河》,深感这是一部以木垒河为支点,生动再现民国新疆历史风云的力作,也不免为其被忽视的命运感到惋惜。但《木垒河》的沉寂并未阻碍李健创作才华的继续施展。除一度引发关注的中篇小说《脐血之地》外,其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天山下》。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山乡巨变”主题小说的一贯写法。虽身为汉族作家,李健在书中却聚焦于哈萨克族牧民在现代化冲击下命运与精神世界的深刻蜕变。女主角巴亚什原是一位恪守传统、只知放牧的哈萨克族女性,经历艰难挣扎后,最终成长为精明能干的女企业家。除巴亚什之外,夏木斯、哈木扎、刘承义、宝兰拜等人物也因塑造扎实、具人性深度而各具亮点。哈萨克族牧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与精神变革,正可视为山乡巨变的深刻写照。

早在1985年,《当代》杂志第2期集中发表了成一、郑义、李锐和罗雪珂四位山西作家的中篇小说。在该期“编者的话”中,章仲锷首次提出“晋军崛起”,本期刊载的中篇小说,均出自山西省中青年作家之手。近几年“晋军”的崛起,引人注目……自此,“晋军崛起”之说风行中国文坛。至1993年,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京夫《八里情仇》、程海《热爱命运》五部长篇小说集中推出,《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撰文提出“陕军东征”,这一说法亦广为流传。如果说“晋军崛起”与“陕军东征”已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那么近两年,随着刘亮程《本巴》《长命》、董立勃《尚青》《垦荒》、张者《天边》及李健《天山下》等长篇小说的集中涌现,在我看来,此种情形也不妨被视为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疆现象”。在这里虽然没有对新疆的这些长篇小说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但这一现象的提出,或许亦有其相应的文学史意义。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疆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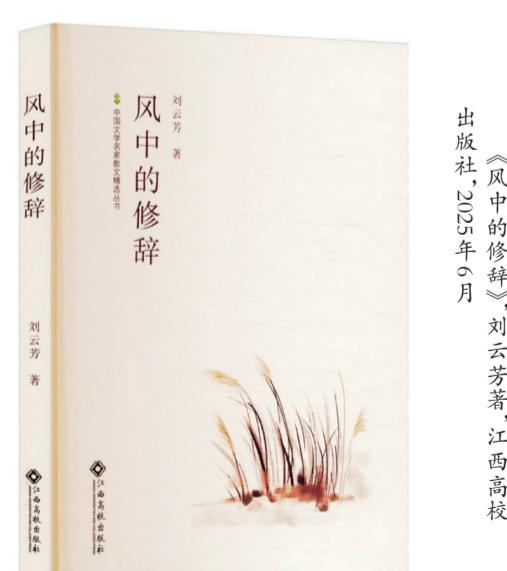
王春林

■评论

日常意象的温暖与光亮

——读刘云芳散文集《风中的修辞》

□翟晓菲



代的,也是古典的。无论是山林中放牛、田野里割草还是高粱秆拼造出的宫殿、麦秸秆编制成的蝈蝈笼子,都传递出传统农事和童年往事的温情。童年记忆、家族故事、现实生活等既是作家的人生风景也是创作素材。面对人生苦难和现实艰辛,刘云芳总是在平凡的日常意象中记录下生命经历的磨难悲苦,书写人性的温暖和闪光。作者少女时期的疾病曾让父母黯然神伤、忧惧不已,读书是她对抗命运、治愈暗疾的“自救药方”。(《书药》)之后,零散记述人生见闻和心灵体悟的文字,冲淡了生命中的沉重,梦想之树上的伤疤与花朵都是追逐梦想时收获的风景。(《梦想树上的伤疤与花朵》)身为家有二宝的妈妈,生活中与孩子相处时的波澜与自然流露出的童真,总是被作者饱含深情地落笔于字里行间。(《那朵云在说什么》)人到中年,双亲遭遇病痛,照护的过程不亚于一场生活修炼,现实的艰辛让作家深感生活的疲惫与沉重。面对生活的坎坷,《酿蜜者》中的丑姨用一种坚韧而善良的态度予以理解和化解。种果园、养蜜蜂,尽力分担子女的不幸和痛苦,将心中的温暖传递给别人,让平淡生活也有感人的光亮。这样一位普通的乡村妇女,不仅有着对生活波折的接纳,而且有将苦涩酿成浪漫的坚韧与豁达,恰似生活中每一个“过滤着各种无奈和苦痛,努力从心里分泌出一丁点儿的甘甜,来支撑自己往前走”的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刘云芳将这些蕴藉着时光和情意的珍珠串联起来,映照出一路坎坷却不断自治的成长身影。

意象贯注着作者的独特情感,标识着作者不同的精神气质,也附丽着不同时代的声音。有了意象,就有了意境,就有了诗,有了生动与美,有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刘云芳把故乡亲人和生活境遇写进日常意象中,在倾注情感体验和人生感悟的基础上,摇曳出情灵婆娑的审美意味,使得平淡生活中的人事,也能生发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

(作者系保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读刘云芳的散文,总能被散落在文章中的那些朴素明净、意蕴丰富的审美意象所打动。在最新的散文集《风中的修辞》中,刘云芳从点滴的日常中提炼诗意、从往事的回望中形成洞见,集中抒写故乡和童年的自然风物,以及人间事象映照出的温暖底色,作品流淌着风的隽永与丰沛,跳荡的结构、绵密的纹理、细腻的情思,诠释出作家对亲情的眷恋、对乡愁的守望以及对时代变迁的感悟,呈现出别样的景致和气质。

土地、原野、树木、山花、河流等都是我们日常所见的自然景物,这些山光野色与作家的情感体悟产生联结后,原本静态的“风物志”便升华为动态的“生命史”,成为作家情绪、情感、情思的投射和彰显,正如朱光潜在所言:“情感是生生不息的,意象也是生生不息的。换一种情感就是换一种意象,换一种意象就是换一种境界。”刘云芳善于截取寻常、明朗的意象,看似司空见惯,实则别开生面,不仅氤氲出杏花、羊群、流云等琐碎而繁杂的诗意,也赋予旧瓦、坛子、木匣等饱含时光与情感润泽的艺术美感,温暖中掩映着感伤,朴素中蕴含着深情,并与现实本身和生存状态连贯重构,晕染出场景平和深挚、情感涌动内敛的生活画卷与悠长情思。

随春风而笼罩满院的野草,既是自然的原色,也是家园的本相。院里的野草曾让母亲心情矛盾而复杂,但当母亲因疾病而不得不搬离故土后,这些野草却成为其与故园相连的证明。野草葳蕤,生长出母亲记忆中的田地、庄稼、房屋、邻居;草色连绵,记录着作家从身体逃离到心灵归乡的心路历程。“我和母亲在讲述那些与村庄有关的过往的时候,其重点不只是那些野草、那些土地、那些人……这一切都是我们情感的载体。我们在诉说自己,在利用他者完成自我的抒情。”(《原野上》)这些浸透着故园思念的萋萋野草,诉说着村庄的逝去时光,也铺展成了作者的精神原野。土地滋养万物,在不能遗弃的土地中,土地成为观照父亲形象和村庄面貌的独特窗口。当村民外出,田园荒芜,机械无法进入那片孤独的沙地时,